中國文學研究　第六十期
2025 年 7 月　頁 313～360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讀史・講史・詩史：

臺靜農白沙時期（1938-1946）書寫的歷史轉向*

鄭　淑　榕**

提　　要

本文探討臺靜農白沙時期（1938-1946）書寫的歷史轉向，說明他如何以「白沙讀史箚記」、《亡明講史》與《白沙草》回應抗戰局勢，藉此反思歷史與現實關係，並重塑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本文關注的是：臺靜農如何看待歷史？其抱持

本文 114.02.14 收稿，114.07.16 審查通過。

* 本文初稿為梅家玲教授「臺靜農與二十世紀文學專題」課程之期末報告，後於「臺大中文系《中國文學研究》六十期暨第五十屆論文發表會」上宣讀。撰寫過程中，承蒙梅家玲教授悉心指導，又蒙與談人賴佩暄教授及諸位匿名審查人惠賜高見，使本文內容得以完善，謹此致謝。此外，陳占揚學長給予我建議及鼓勵，賴潤泉學友與我多次討論與交流意見，特此一併致謝。若本文上有疏漏之處，蓋因本人學力未逮所致，與上述諸位先進無涉，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2507_(60).0007

著怎麼樣的歷史觀？他對時事及歷史的關注如何在「讀史」、《講史》和《白沙草》中分別體現？三者之間有何內在的聯繫或對話？

中日戰爭爆發後，歷史書寫被賦予喚起民族意識與批判時政的重要功能，而臺靜農因在國立編譯館任職，接觸大量史料，促成其創作的歷史轉向。其歷史觀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認為歷史反覆循環、人性難改，因此無法單純將歷史視為可供自省的「鏡子」。

「讀史」與《講史》中，他透過歷史敘述映照、批判當代時局。他透過南明黨爭以史諷今，影射抗戰時期政治混亂，暗示國家若內耗不止終將覆亡。他亦聚焦知識分子的選擇與道德抉擇，批評汪精衛、周作人等投機者，並以錢謙益等歷史人物諷刺變節者的偽善。同時，他運用後漢黨錮之禍等史事對照當代，指出「遠引避禍」成為部分知識分子的自保策略。

隨後，本文運用「詩史」概念，探討臺靜農在《白沙草》中如何藉書寫古典詩來記錄、反映及回應現實。他以杜甫為典範，並透過「黑夜」和「夜不能寐」的文學傳統、《楚辭》典故意象、遺民詩歌傳統，表達對國族危機的哀痛、世道衰敗的憂慮以及知識分子的無力感。臺靜農的白沙時期書寫不僅體現了個人思想與文學轉向，也反映了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透過書寫歷史來思考國家命運與個人選擇，在黑暗時代尋找意義與出路。

關鍵詞：臺靜農、白沙讀史劄記、《亡明講史》、《白沙草》、歷史轉向

A Historical Turn in Tai Ching-nung's Writings during the Baisha Period (1938–1946)

ZHENG Shuk-y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ai Ching-nung's writings during the Baisha period (1938–1946). It explains how he responds to the wartime situation through "Baisha Dushi Zhaji" (「白沙讀史箚記」), *The Demise of the Ming*, and *Baisha Cao* (or *The Draft of Baisha*) (《白沙草》),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re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istorical writing became a crucial means for awaken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riticising political conditions. Tai's position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granted him access to extens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facilitated his shift toward historical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riting. Grounded in the belief that history repeats itself and human nature remains persistent, his deeply tragic historiography prevents history from being simply regarded as a mirror for self-examination.

Through "Baisha Dushi Zhaji" and *The Demise of the Ming*, Tai offered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the wartime situation. He used the Southern Ming's factional strife as an allegory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sorder. Highlighting the moral dilemmas of intellectuals, he directly condemned opportunists and traitors like Wang Jingwei and Zhou Zuoren, while he satirized their hypocris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figure of Qian Qianyi. His parallel to the Eastern Han's "Disaster of the Partisan Prohibitions" （黨錮之禍）further revealed the strategy of seclusion as a means of self-preservation among intellectuals.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Shishi* (詩史),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ai uses classical poetry in *Baisha Cao* to record, reflect on, and respond to the wartime reality. Taking Du Fu as a paradigm and drawing on the literary motifs of darkness and sleepless nights, imagery and allusions from *Chu Ci* (《楚辭》), and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Ming loyalists (*yimin*), Tai expresses sorrow over national catastrophe, anxiety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times, and the profound sense of powerlessness felt by intellectuals. Tai's Baisha-period writings not only reveal his personal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illuminate the way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templated national destiny and individual choices through historical writing, seeking a path forward during a time of darkness.

Keywords: TAI Ching-nung, “Baisha Dushi Zhaji,” *The Demise of the Ming*, *Baisha Cao*, Historical Turn

讀史・講史・詩史：

臺靜農白沙時期（1938-1946）書寫的歷史轉向

鄭　淑　榕

一、前言

對日作戰期間，隨著救國救亡意識的興起，知識分子的歷史研究及書寫蔚成風氣。白沙時期（1938-1946）可謂是臺靜農（1902-1990）生命中的轉折期。過往論者在討論臺靜農這段時期的作品時，大多集中在單一作品如《亡明講史》（下稱《講史》）和《白沙草》，且較關注作品的內部分析。然而，「白沙讀史箚記」（下稱「讀史」）的完整結集出版，[1] 使我們得以將這三部文學創作放置臺靜農生命史及對日作戰的脈絡來理解。「讀史」、《講史》以及作為私人寫作的《白沙草》均涉及臺靜農對時事及歷史的思索，三者同時呈現了臺靜農在白沙

[1] 「白沙讀史箚記」共十篇，除〈談薙髮〉外，其餘九篇曾被分別輯入《靜農佚文集》（新北：聯經，2018 年）的「散文」及「論文」兩種類屬。不過，根據梅家玲教授對收於臺大總圖書館特藏資料的「白沙讀史箚記」的考察，發現臺靜農在這十篇雜文發表後，進行了審慎的校訂和繕錄，且為修訂稿編寫目次及親題書名。梅教授認為：「如此審慎以對，正是為日後公開出版而預作準備。可惜事與願違，始終未能付梓。」見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 年），頁 24、25 注 38。

時期的創作與研究發生顯著的歷史轉向——從新文藝轉向史料考述及古典詩寫作，特別關注歷史的作用及其與時事的聯繫。這一變化固然與當時的時代風氣密切相關，但更體現其個人關懷。本文欲探察的是：臺靜農如何看待歷史？其抱持著怎麼樣的歷史觀？他對時事及歷史的關注如何在「讀史」、《講史》和《白沙草》中分別體現？三者之間有何內在的聯繫或對話？

需要闡明的是，臺靜農書寫的歷史並非只站於歷史本位，對史料進行排比說明，更是帶有其史識詩心的文學式寫作——他通過閱讀、消化歷史，再以不同形式呈現。「讀史」、《講史》看似是史料的鋪陳複寫，實則有其主觀的建構，甚至寄寓褒貶於其中。《白沙草》雖未直接寫及歷史，但讀史不但觸發且豐富了臺靜農對時代的興亡之感和憂患之思，更使他得以訴諸中國古典文化資源以回應當下的國族危機，用私密的心志感懷為時代歷史寫下個人註腳，其古典詩作由此具備了「詩史」的潛能。故此，本文先論述臺靜農寫作的歷史轉向與時代環境的關係，以及其所持的歷史觀，從而引出他在「讀史」和《講史》中對歷史與當下的共通點的關注，包括黨爭、官員腐敗、社會亂象以及古今文人在相似處境中的出路。此後再闡述《白沙草》中的「詩史」：臺靜農如何通過古典詩這一體式訴諸詩歌的歷史乃至中國文學文化傳統，以此反映現實、回應當下。

二、臺靜農的歷史轉向及歷史觀

在抗敵救國的民族意識推動下，歷史研究與寫作成為一時風氣。郭沫若（1892-1978）表明，在抗戰這一特殊歷史環境中，人們共同感受到的風氣和影響促進了歷史研究的興起：「歷史研究的興趣，不僅在我一個人重新抬起了頭來，同一傾向近年來顯然地又形成了風氣。」[1]當時通俗讀物編刊社所出版之書

[1] 郭沫若：〈後記〉，《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頁 410-411。

刊多以岳飛（1103-1142）、史可法（1602-1645）、鄭成功（1624-1662）等在歷史上具抵抗意識的英雄人物為書寫對象，來回應時局，抗日救國。[2] 政府及相關部門也提出對歷史的關注，期盼藉此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救亡圖存。1938 年 8 月，蔣介石（1887-1975）在題為〈革命的教育〉的訓詞中講到：「惟有使一般學生和國民認識本國的歷史和地理，始能使他明禮義知廉恥，以激發其愛國的良知，燃燒其愛國熱忱，而發揮他救民救世的良能。」[3] 所以，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審的民眾讀物以發展民族意識、培養國民道德為目的，[4] 尤其著重採編愛國的歷史人物傳記，如臺靜農就曾擔任青年及民眾讀物臨時編輯員，撰寫《民族英雄張蒼水》（後擴充為《晚明講史》）。[5] 由此，在抗戰期間研究及書寫歷史蔚然成風。

至於臺靜農寫作的歷史轉向，則與抗戰時期擔任國立編譯館的編譯工作關係密切。臺靜農舉家赴川後，定居江津白沙鎮，而歷經數次遷徙的國立編譯館亦在 1939 年 4 月遷至當地，臺靜農便在該年 7 月至 1942 年擔任起國立編譯館的工作，負責整理以社會史為主的史料。由於國立編譯館的圖書室藏書豐富，是當地學人借閱圖書的中心，這份工作為臺靜農接觸史料提供機會及便利，所以其多數時間都獨居於編譯館宿舍，潛心讀書寫作，「一兩週才返家一次」（臺益堅語）。[6]

[2] 劉龍心：〈通俗讀物編刊社與戰時歷史書寫（1933-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總第 64 期（2009 年 6 月），頁 94-95。

[3] 蔣中正：〈革命的教育〉，《教育通訊（漢口）》1938 年第 37 期，頁 20。

[4] 陳禮江：〈教育部近兩年編審民衆讀物之經過〉，《教育通訊（漢口）》1938 年第 39 期，頁 21。

[5] 詳細更名過程見 1938 年 9 月 23 日臺靜農致教育部信函，載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致教育部函七通〉，《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附編三》，頁 428。

[6] 臺益堅：〈爝火——追悼先父臺靜農〉，《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 2 期，頁 117。

透過觀察臺靜農在白沙期間的散文及論文發表情況，可以發現其讀史不僅是為了工作，也有思考、回應時局的意圖。

文題	發表時期（年/月/日）	時事/歷史	收入「讀史」
〈談「倭寇底直系子孫」〉（散文）	1939/01/21	時事	
〈國際的戰友〉（散文）	1939/01/28		
〈談薙髮〉（雜文）	1939/07/28	歷史	✓
〈「士大夫好為人奴」〉（散文）	1939/08/25		✓
〈魯迅眼中的汪精衛〉（散文）	1939/10/01	時事	
〈「歷史之重演」〉（散文）	1940/03/11	歷史	✓
〈秀才〉（散文）	1940/03/13		✓
〈關於販賣生口〉（散文）	1940/05/28		✓
〈關於買賣婦女〉（散文）	1940/05/29		✓
〈跋後漢兩碑文〉（論文，後擴充為論文〈錮黨史話〉）	1940/10/28		✓
〈紀錢牧齋遺事〉（論文）	1940/10		✓
〈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散文，後擴充為論文〈錮黨史話〉）	1940/11/22		✓
〈讀《日知錄校記》〉（論文）	1941/03/20		✓
〈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散文）	1942/04/05	時事	
〈老人的胡鬧〉（散文）	1942/06/15		

〈南宋人體犧牲祭〉（論文）	1945	歷史	
〈錮黨史話〉（論文）	1946/10/18		

表一：臺靜農在白沙期間的散文及論文發表情況[7]

早在 1920 年代，臺靜農已透過文學創作回應時事，如新詩〈寶刀〉（1922）讚頌日本青年長岡艮一（1903-1980）刺殺日本首相原敬（1856-1921）的行為，散文〈去年今日之回憶〉（1925）則以諷刺筆法寫北洋軍閥對百姓生活的破壞，[8]但當時顯然未有將時事與歷史聯繫起來的傾向。然而在白沙時期，歷史已成為他思考當下時事的重要參照：他受時事觸動而回到歷史，又藉著歷史思考當前時事。通過以上表格，我們可以注意到，時事文章與後來大多收入「讀史」的歷史文章呈現錯落的發表狀態，而兩者主題緊密相關。這些文章頗多述及抗戰時局與知識分子的氣節問題（下文詳論），可見這段時期臺靜農的寫作意圖十分明確。

既然如此，首先需要追問的是：臺靜農持有怎樣的歷史觀？這段時期的不少文章都論及其歷史觀，如〈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一文，他以「轆轤繩子」的形象譬喻表達對民族歷史的看法：「一個民族的歷史，總不會被切斷被抹殺的，這好像一根轆轤繩子，雖然落到幾丈深的井裡，仍舊可以汲回去」。[9] 他認為現在和過去並非截然分離，而是具有連續特質：當我們看到一個現象，總能沿著繩子的一端汲回去，回到歷史探尋根源所在。而這種連續性正正體現在歷史的不斷重演，如〈歷史之重演〉一文，藉由引述陳登原《歷史之重演》中「歷史由沿

[7] 據陳子善、秦賢次合編：〈臺靜農先生前期創作目錄（一九二二——一九四八）〉整理，載《靜農佚文集》，頁 292-294；〈談薙髮〉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79-382。

[8] 臺靜農：〈寶刀〉，載臺靜農撰，許禮平編注：《臺靜農詩集・新詩》（香港：翰墨軒，2001 年），頁 72-78；〈去年今日之回憶〉，《靜農佚文集》，頁 58-59。

[9] 臺靜農：〈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5-396。

襲古之言語而重演例」，以及陳氏點評「其在今日，豈無沿襲之者哉？」一語，[10] 臺靜農表明歷史是不斷沿襲過去的觀點，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千古同轍，不足為奇也。」（〈關於販賣生口〉）[11] 基於這種特性，他鼓勵當時的年輕人應該通過讀史來認知及瞭解時下狀況。[12]

不過，緊隨勉勵其後的話語值得細思：「雖然我並不相信歷史是一面鏡子」。[13] 史與鏡子的比喻使人聯想到《舊唐書・魏徵傳》中唐太宗（598-649）對魏徵（580-643）的評價：「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14] 臺靜農如此悲觀地認為歷史無法起到讓照鏡者自省的作用，是因為歷史的連續特質是建基在人性的不變，所以有關「惡不可為善亦難為」的話語才會在范滂（137-169）、劉湛之（？-？）、趙母（？-？）的時代不斷重演及生效。[15] 即便年輕人通過讀史瞭解到歷史的連續，也無可避免地重蹈前人覆轍——「那少男少女又如何能夠了解呢？一旦了解過來時，恐怕已經踏上自己父母的足跡了。」[16]

三、「讀史」、《講史》中的古今對照

面對天崩地坼的抗戰情勢，臺靜農通過回溯漢末（184-220）、南明（1644-1662）亡國的原因以反思時局。尤其是南明面臨的危機與當下情境有不少共通之處。最明顯的是，南明和當時民國都對抗著「外族」——滿清／日本——入

[10] 臺靜農：〈歷史之重演〉，《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2-383。
[11] 臺靜農：〈關於販賣生口〉，《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4。
[12] 「我想，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都應該讀一讀（按：〈黨錮列傳〉）」，見臺靜農：〈錮黨史話・一〉，《靜農佚文集》，頁 257。
[13] 同上注。
[14]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71，頁 2561。
[15] 臺靜農：〈歷史之重演〉，《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2-383。
[16] 同上注，頁 383。

侵，於是南明的失敗就自然成為了當下的參照和揮之不去的陰影，歷史與現時的共通點無可避免成為臺靜農的關注所在。

（一）黨爭、官員腐敗、社會亂象

臺靜農首先關注到的，是黨爭、內鬥的問題。《講史》中，他以南明亡國史為背景，詳述馬士英（1596-1674）與左良玉（1599-1645）之爭，突顯權力爭奪如何導致國家危亡。當時馬士英意圖模仿曹操（155-220）挾天子以令諸侯，不依賢愚立新君，主張立昏愚的福王（即弘光帝，1607-1646），[17] 且彈劾讒陷史可法等正臣，導致朝廷只剩下見風駛舵之輩。寧南伯左良玉則以「清君側」、「定儲位」之名，傳檄討伐馬黨。[18] 當時清兵已攻下河南，但比起清兵，馬黨更恐懼左軍，因為左軍的目標正是他們。馬、左內鬨之際，清軍兵分兩路趁機南下，但馬士英不但不選將添兵援救，還抱著「此時寧願清來，不願左來」的想法，最終危及南明宗社。[19] 臺靜農現身評論馬、左之爭時感慨「不過黨爭，國家卻未放在心上」，可見其對黨爭危害家國存亡的痛心。[20] 至於這段書寫究竟影射何種現實問題，不宜簡化為單一的歷史對應。此些內容或許與國共合作的潛在矛盾有關，也可能觸及國民黨內部蔣、汪路線之爭，甚至讓人聯想到東北易幟過程中，儲君急於排除楊虎城（1893-1949）等老臣勢力的權力鬥爭。[21] 民國政治版圖錯綜複雜，臺靜農以歷史寄意時，未必只指向某一特定事件，更可能在於提出普遍的歷史警示：當國家面對外患之際，若內鬥不止，便會使國家陷入危急存亡之秋。

---

[17] 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頁 73。
[18] 同上注，頁 115。
[19] 同上注，頁 133。
[20] 同上注，頁 137。
[21] 除了國共合作的潛在矛盾外，匿名審查人提醒亦有可能與蔣、汪路線之爭，以及東北易幟的權力鬥爭有關，筆者十分同意，故將其納入正文並申明出處。

關注黨爭之餘，臺靜農同樣關心因吏治敗壞而引發的社會亂象。他依循「轆轤繩子」的歷史觀，從〈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到《講史》，不斷揭示從後漢黨錮到南明朝堂的權臣結黨，以及由此衍生的弊病。在〈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中，臺靜農引《後漢書》〈黨錮列傳〉及〈宦者列傳〉，講述黨事最初影響不大（「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但愈演愈烈，持續二十餘年之久，以致「海內塗炭」，天下善士皆受牽連。[22] 《講史》則展現官員不務正業：馬士英內結阮大鋮（1587-1646）、錢謙益（1582-1664）外結四鎮總兵，貪贓納賄、謀陷正臣；清兵即將兵臨城下時，官員關心的卻是講經的日子；且為了討好弘光皇帝而派人到蘇杭尋查年青女子，逼得她們上吊投水。[23] 可見官員腐敗對國家政治、社會、百姓生活造成的破壞。通過書寫歷史上由官員腐敗所致的民生凋弊，以此聯繫到自己所處時局的腐敗問題，指出統治階層的不作為與自私，如何在國家危機中加劇民生困境。

而臺靜農對婦女生口買賣的討論中，也反映出吏治敗壞使得民間上行下效的問題。婦女買賣的歷史源於奴隸制度，這一問題自古代中國延續至民國。儘管國民政府早於 1920 年代已施行禁止奴婢之令，當時的法憲也看似比十年前愈加完備，但從重慶婦女界提請政府嚴禁買賣婦女的議案以及臺靜農的委婉表達（「若問事實若何，更難言矣」）可見，女婢買賣的陋習仍然存在。[24] 至於此陋習為何仍未消失，臺靜農則通過援引史料說明，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時官販生口礙法」一事表明現任官員也有參與女婢買賣的行為，官官相護，所以未有人被檢舉。[25] 而從《宋會要》中臨安府尹趙子瀟（1101-1166）的話語可知，品官之家雇用女使時會故意避免立定年限，使得這些女性淪為「永無出期」的婢

[22] 臺靜農：〈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6。
[23] 臺靜農：《亡明講史》，頁 75、144、76-77。
[24] 臺靜農：〈關於買賣婦女〉，《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8、391。
[25] 同上注，頁 389-390。

妾，這些官員的行為都是使「先前功令之推行，未收實效」的原因。[26] 故此，臺靜農表明「販賣生口，既不是偶然，亦不是一時一地之事」，[27] 統治階級的腐敗使民間上行下效，別有用心者便趁國難、社會混亂之際販賣流人婦女發國難財。他且在〈關於販賣生口〉一文的尾聲將宋代國難與當前情境聯繫在一起，關注百姓的生存境況：「正如民族抗戰中的今日，而大部分的老百姓之生命線皆繫之於走私的『發國難財者』之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千古同轍，不足為奇也。」[28]

（二）古今文人的選擇及出路

臺靜農尤其關注知識分子在如此情形中有何出路，而其筆下呈現的時下文人，不是失去風骨、依附權勢，就是見風使舵、變節投敵。早在 1926 年，他便批判當時的學者紳士為了迎合某些組織或權威而拋棄自身原則和價值，並形容他們像披上狗皮假扮獅子，表面上裝作有「學問」、「道德」和「理性」，實則是虛偽的。[29] 而在白沙時期，舒蕪（1922-2009）的回憶文章記到，當時有些學者向蔣介石獻九鼎，且在鼎上刻有「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的頌讚皇帝的話語，臺靜農得知後氣得罵髒話。[30] 那臺靜農如何藉歷史批判這些阿諛奉承者？他引《後漢書・宦者列傳敘》中的一段文字：

> 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

[26] 臺靜農：〈關於買賣婦女〉、〈關於販賣生口〉，《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0-391；393。
[27] 臺靜農：〈關於販賣生口〉，《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3。
[28] 同上注，頁 394。
[29] 臺靜農：〈人獸觀〉，《靜農佚文集》，頁 73-74。
[30] 舒蕪：〈憶臺靜農先生〉，載《臺靜農詩集・附錄》，頁 19-20。

> 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挈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31]

引文描述了兩類知識分子的命運。為自我利益而依附權勢者，最終腐化自我，互相損害，造成國家政治的衰敗。臺靜農如此批評這類文人：「以太監而參與定策，其政權之敗壞可知；以名士而走太監門路，則其賢佞可知」。[32] 善士志士則無法施展抱負，甚至遭受誣構；心懷憤懣者以言論奮發反抗更因此招惹災禍，導致「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的悲慘命運。桓、靈二帝期間，太學生因不滿宦官干政而有所批判，最終慘遭構陷、被殺。儘管其中有倖存者，如「八顧」之一的郭泰（128-169），但臺靜農認為他在「羅網高懸」的情形中仍能顯露憤慨而未被黨禍實屬「僥倖」。[33] 臺靜農由此感慨：「然無太監專權，則無黨錮之禍；既有黨錮之禍，則有覆亡之日」，[34] 以後漢宦官專政及黨錮之禍的歷史比對當今，隱約吐露對國家未來的擔憂。

臺靜農亦在文章中批評當時的見風使舵者，如汪精衛（1883-1944）及林房雄（1903-1975）。汪精衛因脫離重慶，倡導「和平運動」，發表〈艷電〉而被國民政府視為叛國者，[35] 臺靜農則以「無恥之極」形容其變節，又借吳敬恆（1865-1953）的話表達他對汪精衛的態度：「他無論如何能學孫悟空的善變，終變不了那條尾巴，人家看了，祇是一位畜生！」[36] 至於林房雄，其將日本軍國主義視為「倭寇底直系子孫」，且將其對外侵略的行為美化作「日本民族底活力底氾濫」。臺靜農便指出當時有些從軍來華的日本作家「敢於正視軍閥的狂暴，而撕

---

31 臺靜農：〈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6。
32 臺靜農：〈跋後漢兩碑文〉，《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4。
33 臺靜農：〈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7-398。
34 臺靜農：〈跋後漢兩碑文〉，《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5。
35 楊治宜著：《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新北：聯經，2024 年），頁 215-241。
36 臺靜農：〈魯迅眼中的汪精衛〉，《靜農佚文集》，頁 96、101。

毀其強盜旗幟」，林房雄卻像奴才般「屈膝於猙獰的軍閥之前，而舐其刺刀上的鮮血，以博得主子的笑樂」，以此諷刺這位「日本『有名的社會主義作家』」。[37]

這種見風使舵的行徑，臺靜農通過回顧歷史，發現在宋元亡國、明清易代之際比比皆是。〈談薙髮〉中山東進士孫之獬（1591-1647）率先薙髮迎降盼得歡心；〈秀才〉中太學生爭獻軍事攻略以求生附勢；〈士大夫好為人奴〉中吳三桂（1612-1678）多年豢養的文武百官紛紛投敵，就連其姑爺胡國柱（？-1681）也領軍叛變。[38] 而在《講史》中，臺靜農是如此描寫李建泰（？-1649）投敵的：

> 闖王問道：「你就是李督師麼，你自請督師，崇禎親自郊送，煞是闊氣，為什麼也來了？」
>
> 李建泰聽了不免驚慌，連忙叩頭道：「那是下官金蟬脫殼之計，原想藉督師為名，回山西報效陛下，故始終不敢同陛下交鋒！」
>
> 「照你說來，為什麼保定還在抵抗，不來投降？」
>
> 「那是知府何復都指揮劉惠嗣等不識天命，頑抗王師，罪臣自聽陛下入了京師，即進城逃來！」[39]

面對闖王李自成（1606-1645）的質問，李建泰主動稱臣（「下官」、「罪臣」），稱闖王為「陛下」，又稱其自請督師的行為實為金蟬脫殼之計，並把保定的抵抗推卸給地方官員，以求自保。後來豫王多鐸（1614-1649）入城時，原以為「明朝大臣中，定有不少忠臣，不願歸順」，可不曾想文武百官都不約而同地聚集洪武門外，按照官職秩序跪在大路兩旁等候豫王大駕，李建泰、趙之龍（？-1654）

[37] 臺靜農：〈談「倭寇底直系子孫」〉，《靜農佚文集》，頁 83、86。
[38] 臺靜農：〈談薙髮〉、〈秀才〉、〈士大夫好為人奴〉，《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0、384、378。
[39] 臺靜農：《亡明講史》，頁 41-42。

等人更在「大雨淋漓，道路泥濘不堪」的情況仍「匍匐上去，恭恭敬敬」地行正式及隆重的四拜禮，[40] 從場景設定及動作描寫都突顯出這群官員的刻意逢迎之心。而臺靜農通過歷史的後見之明，總結這些見風使舵者的下場：「其實已經是三四等的奴隸了，而欲往上爬，豈非白癡？……若問這些人在……主子眼中如何，仍舊是第三等第四等的奴隸也。」[41]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臺靜農的老師、留在北平的周作人（1885-1967）。廖肇亨亦有提及此點，[42] 但臺靜農對周作人的態度，除了廖氏文章提到的無奈及忿恨外，亦有道德批判的意味，並隨著時間逐漸增強。起初臺靜農不相信他會投敵：當友人告知，周作人為宣揚東亞文化而出現在北平廣播電台，他以家中沒有收音機不能親自辨別為由，「還不能夠即刻相信」；聽聞到周作人受敵人欺騙，更代入周作人的角度為其辯解：「知堂老人縱深於世故，難保不上敵人的當」，「益使吾人對於此老一度上當而原其苦心也」。[43] 但得悉周作人參加了敵人的座談會（即「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且有照片為證，不禁感到「一種窒息的痛苦」及惘然，想起在七七事變前三個月買到周作人出版的新書《瓜豆集》時的歡喜，「緬想著那麼淵雅沖淡的知堂老人，竟混跡於其平日所怨恨與輕蔑的敵人群中，真如墮在五里霧中，四顧白茫茫，無從摸索。」[44] 由此，臺靜農轉向批判周作人的叛變。抗戰前，周作人在文章中強烈表達了對日本的憎恨：

---

[40] 同上注，頁 158、152。「四拜禮」為明代正式的禮儀規範，如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記：「凡朝見稽首，頓首五拜，乃臣下見君上之禮。先稽首頓首，四拜後一拜叩頭成禮。稽首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史部，第 598 冊，卷 66，頁 109b。

[41] 臺靜農：〈秀才〉，《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6。

[42] 廖肇亨：〈希望・絕望・虛妄——試論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圖像與文化詮釋〉，《明代研究》總第 11 期（2008 年 12 月），頁 100-101。

[43] 臺靜農：〈老人的胡鬧〉，《靜農佚文集》，頁 129、132。

[44] 同上注，頁 132。

「目下中國對於日本只有怨恨，這是極當然的。」（〈談日本文化書〉）且據臺靜農描述，周作人在文章〈投筆〉中採取主戰態度：「政府究竟同日本打不打呢，我在預備著投筆呢。這一面是諷刺政府國策的猶疑，一面也是耐不住了，要求『一刀一槍的廝殺』起來。」[45] 但當戰爭爆發後，周作人「不『投筆』而投降」了，其所宣傳的東亞文化，說到底「即日本人是主子，中國人是奴隸而已」。[46]

臺靜農的辛辣批判不限於此，他在「讀史」中通過梳理錢謙益在南明時期的事跡，將其與周作人並舉。[47] 周、錢二人在其時代同為文豪，同時又晚節不保。儘管現今學界以重新檢討了二人的晚節問題，不再以「漢奸」、「貳臣」的標籤審判二人，[48] 但臺靜農及時人不免受時代及所處位置限制，未能縱觀歷史全局。在〈紀錢牧齋遺事〉中，臺靜農引〈長歌虞山行〉及《罪惟錄・安宗簡皇帝本紀》，指出錢謙益是「率先降附」、「首倡迎降者」。[49] 至於周作人，根據北大校長蔣夢麟（1886-1964）的說法，他曾示意周作人留在北平，因其和日人關係較深，可以幫忙保護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不致被破壞。[50] 儘管蔣夢麟的說法是為周作人辯解，但也證實了周作人與日關係非淺，所以時人大多懷疑其與日本早通款曲。臺靜農認為當時遭遇的變遷動盪在任何方面都無法與晚明相比，周作人卻違背了其在〈自己的文章〉中的說辭——「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

[45] 同上注，頁 132、133。
[46] 同上注，頁 133、134。
[47] 廖肇亨於〈希望・絕望・虛妄——試論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圖像與文化詮釋〉一文提出，「比跡於牧齋者」或許也廣義涵蓋了龍榆生（1902-1966）等人，但龍氏的文壇學界影響力尚不足以與錢謙益相提並論，見頁 100。
[48] 如錢謙益雖背負貳臣罵名，卻與海外復明運動頗有往來，周作人亦與地下共產黨多有接觸，見上注，頁 101。
[49] 臺靜農：〈紀錢牧齋遺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404-406。
[50] 蔣夢麟：〈談中國新文藝運動——為紀念五四與文藝節而作〉，《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 年），頁 343。

斯哭於斯的地方」，「一旦歌哭無地，忽爾轉臉陪人喜笑」，[51] 其虛偽表現與錢謙益無異。故此，他藉評論《江南見聞錄》對錢謙益的記載，指出當時錢謙益已在豫王大營侍奉，卻「忽然」痛惜明太祖三百年之王業而落淚四拜，[52] 諷刺其虛偽，其眼淚也不過是鱷魚的眼淚。最後他在附記寫到，他將錢謙益「平生瓦裂」的碎片收集、拼湊，但最終「也不會成一個像樣子的東西」，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意在批判周作人如「經不起霜雪的瓦，遇了微風也會裂的，——這沒有用的東西，只有讓他裂罷。」[53]

抗戰期間，錢謙益的「貳臣」身分、事跡及相關批判成為人們書寫的重點，而臺靜農《講史》中的錢謙益的著重點也與時人相似，他通過刻畫錢謙益的心理，以此間接影射周作人。嚴志雄研究近代上海《申報》中的錢謙益書寫時，發現錢謙益的「貳臣」身分在抗戰語境中被等同於「漢奸」，「仕清」猶如「仕日」，以此借古諷今、指桑罵槐。[54] 而在《講史》中，錢謙益的形象是自私自利的，為個人利益而拋棄對國家的忠誠。崇禎帝（1611-1644）殉國、明都南遷後，大臣謀劃另立新主，錢謙益因得知阮大鋮和馬士英同夥而「即將得志」，因此不顧昔日「政敵」的身分，「日日奔走阮門」依附阮大鋮，遂得禮部尚書一職。[55] 此後，錢謙益更積極奉承阮大鋮，甚至讓「他寵愛的夫人柳如是」討其歡心，以此和阮大鋮建立更好的關係，讓他可以「進薦入閣做宰相」。[56] 但在馬士英眼中，錢謙益始終是「東林黨投降過來的」，不是自己人，不過看在他和阮大鋮的師生

[51] 臺靜農：〈老人的胡鬧〉，《靜農佚文集》，頁 134。
[52] 臺靜農：〈紀錢牧齋遺事〉，《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406。
[53] 同上注，頁 409、410。
[54] 嚴志雄：〈《申報》中的錢謙益〉，載林宗正、張伯偉主編：《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詩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330。相關例子見頁 326、328。
[55] 臺靜農：《亡明講史》，頁 74。
[56] 同上注，頁 74-75。

關係才讓他擔任禮部尚書，所以即便他和馬、阮同夥，仍不得志。[57] 聯繫上文提及的「日本人（主）—中國人（奴）」公式，這和錢、阮的依附關係以及「自己人—非自己人」的劃分可以說是如出一轍。當清兵逐漸侵近時，錢謙益面對生與死、榮與忠的抉擇，毫不猶疑地選擇出賣國家以自保的道路，與豫王「早通款曲」。臺靜農形容錢謙益是「老謀深算」的，因為他在豫王還未入城時早已安排門客「密見豫王，私通消息」，使得他在豫王心中獲得非同小可的地位：「識時務，心機靈活，不是死讀書人，難怪他會作詩，高人一等。」[58] 而上文提及時人大多懷疑周作人與日本人早通款曲，可見這些帶反諷意味的形容詞即流露臺靜農對周作人的態度。此外，臺靜農在部分情節對錢謙益的諷刺更為明顯。如錢謙益目睹馬士英遠行避難，暗嘲其不忠：「你宰相不殉國，誰還殉國？」[59] 這意味著錢謙益認為職權最大的官員都選擇自保，其他官員也不必堅守忠義。然而，馬士英只是選擇逃離，錢謙益卻是投敵，且以這番嘲諷將自己投敵的選擇合理化，兩者相較之，錢謙益才是臺靜農真正想要嘲諷的人。又如豫王在宴會中質問被俘虜的弘光皇帝為何「擅自做了皇帝」時，「原是擁立福王」的錢謙益陷入尷尬的處境，而他「默默無言」的反應，更突顯了臺靜農對其為生存而放棄忠誠的尖銳諷刺。[60]

臺靜農不願與阿諛奉承者及見風使舵者同流合污，於是他在歷史中找到以隱逸為遠禍的生存方法。他在〈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中指出「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的命運是不斷延續的，但歷史除了記載善士離被災毒的苦痛經歷，還展現出「遠引避禍」的生活方式。《後漢書・逸民列傳・陳留老父傳》中記載了陳留老父對遭遇黨禍的陳留、張升的回應：「夫龍不潛（按：《後漢書》作「隱」）

[57] 同上注，頁 76、143。
[58] 同上注，頁 155。
[59] 同上注，頁 148。
[60] 同上注，頁 167。

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61]「鳳不藏羽」是對《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典故的反用：鳳為祥瑞之鳥，唯有政治清明才會出現，但現在天下無道竟也出現了，接輿以鳳鳥比孔子，諷刺孔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的不合時宜，爾後以當時從政者處境之危險勸告孔子「來者猶可追」，現在應避亂隱居。[62] 而「龍不潛〔按：《後漢書》作「隱」〕鱗」讓人聯想到《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隱鱗」則是以神龍隱匿其鱗，喻賢者待時而動。以上可見，臺靜農顯然認為陳留老父是楚狂接輿一流人物：動盪時期，即使是才德之士也難以自保，無法躲避迫害，既知「網羅高懸」，故主張龍要潛鱗，鳳要藏羽，以出世隱居甚至佯狂放誕以避世禍。由此，臺靜農通過歷史，找到「在屠殺與被屠殺以外，尚有一種『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的人生態度。」[63]

四、《白沙草》中的「詩史」

面對國土淪陷、民族存亡之秋，作為中國文化精粹的古典詩以「發揚民族精神、激起抗敵情緒」的方式，召喚新文學家回歸此文體。古典詩作為傳統文類之一，較新文體更能體現作家的民族性，其易誦易記的特質又較其他傳統文類優勝，加之其在反映亂世、宣揚救國救亡方面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根基，因而促使新文學家對這一文體的回歸。[64] 這樣的時代風氣同時切合臺靜農個人思想的內

[61] 臺靜農：〈瞻烏爰止，於誰之屋〉，頁 397；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卷 83，頁 2776。

[62]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見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微子第十八〉，《論語注疏解經》，載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165a。

[63] 臺靜農：〈錮黨史話・一〉，《靜農佚文集》，頁 260。

[64] 林立：〈骸骨的迷戀：論新文學家創作舊體詩的緣由〉，《東方文化》總第 43 卷第 1、2 期合刊（2010 年 12 月），頁 217-222。

在理路——「轆轤繩子」的重演史觀，相信過去的資源能夠為理解當下而被運用——所以臺靜農回歸古典詩寫作，實質上是相信詩中調度的傳統資源依然能在新時代生效。

古與今的交織不僅意味著同一根轆轤繩子所象徵的線性時間，更構成繁複的多元、多重對話，[65] 臺靜農的古典詩寫作由此被賦予了「詩史」的特質。「詩史」的概念最早見於晚唐孟棨對杜甫（712-770）的評價，稱許杜甫善以詩敘事、紀錄時事，[66] 後來意義不斷增衍，其用於文學批評的意義及應用範圍也隨之擴充。張暉指出，在古典傳統中，無論詩史的定義如何衍生，最終都指向「描寫現實、反映現實、記載現實的內容」的詩歌核心內涵。[67] 不過，若將詩史概念挪借來討論現當代文學創作，也許可以採取更開闊的定義，正如王德威所言：「唯有詩歌——文學——或許才真正能從消失的記憶和故紙堆中，喚醒強烈的個體情性，揭示一言難盡的真相，從而肯定『史亡而後詩作』的真諦。」[68] 那麼，臺靜農如何透過訴諸詩歌乃至中國文學文化傳統，如杜甫入蜀、「黑夜」與「夜不能寐」、《楚辭》典故意象、及遺民傳統，來反映現實、回應當下，即本節關注的重點。

---

[65] 王德威於〈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言：「古與今的交織在詩中不再是單向的線性時間，而是構成繁複的多元、多重指涉」。載氏著，涂航等譯：《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2017 年），頁 551。

[66]「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見唐・孟棨撰：《本事詩・高逸第三》（陽山顧氏文房叢書，據明正德顧元慶輯刊），頁 16b。

[67] 張暉著：《中國「詩史」傳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年），頁 100-147。

[68] 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 65 期（2017 年 7 月），頁 306。

（一）杜甫入蜀

觀乎臺靜農後來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杜甫一節，可見是以「熱筆」寫杜甫入蜀的情況。[69] 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亂尚未平息，史思明（703-761）大敗唐軍後自稱大燕皇帝，西方吐蕃的勢力則不斷膨脹，嚴重威脅到唐王朝。杜甫先前因房琯（696-763）之事觸怒肅宗（711-762），後遭疏遠，故於同年辭去官職，自長安取道秦州、同谷入蜀至成都。因生活所迫而不斷流離遷徙的經歷讓杜甫感慨道：「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70] 臺靜農形容杜甫入蜀的那一年「生活最為悽苦，大有遑遑無所之之感。」「原來平生懷抱，一身許國，終不免拖家攜眷奔走於飢餓路上，能不令詩人悲嘆？」[71] 其時，臺靜農也是舉家入蜀，生活困頓。其子臺益堅回憶他們移家黑石山後，當時臺靜農在國立編譯館工作的「收入根本不敷家用」，除了姊姊入國立中學就讀，他們兄妹兩人便輟學在家，「每天步行二十里去鎮上打油背米，下午至山中挖菌、尋野菜」，有時還下水田撿田螺、捉黃鱔。[72] 臺靜農也在與林辰的書信（1946 年 5 月 22 日）中吐露生活狀況：「至於目前生活，則變賣衣物（反正要賣出去的）尚可支持些時，友人亦有接濟也。」[73] 這段時期之艱苦以致他到了晚年仍念念不忘，為妻子于韵閑（1902-1985）作的悼亡詩中，便寫及其因生活困苦而生的歉疚之

[69] 何寄澎及許銘全借用林文月〈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的術語，以「熱筆」形容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中較為主觀、帶有情感溫度的筆調。見〈文學史書寫的典型——寫於臺靜農先生《中國文學史》三版付梓前〉，《書目季刊》第 49 卷第 3 期（2015 年 12 月），頁 141。

[70]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9，頁 705。

[71] 臺靜農著：《中國文學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年），第 5 篇，第 4 章，頁 437。

[72] 臺益堅：〈爝火〉，頁 117。

[73] 臺靜農：〈典衣〉，《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0，注 1。

情（「柴米商量累汝多」）。[74] 以上可見，白沙時期的臺靜農與杜甫的情況十分相似：同樣遭遇家國變亂，亦有入蜀的經歷，相似的遭遇使得臺靜農後來撰寫《中國文學史》時對杜甫有所觸動，因此看似寫杜甫，實則是借杜甫言己情。

臺靜農對杜甫的同情共感也體現在白沙時期的詩作中。正如方瑜所言：「杜甫入蜀居草堂，家國兼憂，生計困窘，與老師（按：臺靜農）居蜀九年之境況，頗相符應，也許因此而有仿杜之作。」其中，方瑜認為兩首五古長篇〈寄兼士師重慶〉和〈題白匋為繪半山草堂圖〉「全仿杜甫」，「不論技巧形式與內涵精神都神似少陵」。[75] 賴佩暄亦指出「臺先生與杜甫在精神與境況上多有相通之處」。[76] 在〈題白匋為繪半山草堂圖〉的首四聯中，顯然可見臺靜農自比杜甫的意圖：

> 少陵棲江濱，漸喜交游絕。草堂足高隱，不共世情熱。自我來蜀江，八載驚波瞥。雖猶涸風塵，懷抱凜冰雪。……[77]

《中國文學史》講述杜甫居長安十年，因見「當時政治腐敗，君臣淫樂，不顧民生，聚斂不已，浩然有歸隱之意。」[78] 這首詩的首兩聯即描述杜甫入蜀後厭倦交遊、隱居草堂，處於喧囂世俗之外。詩人自入蜀以來，在動盪時局中歷經八載（由此推測此詩應作於 1946 年），但內心仍「懷抱凜冰雪」，與杜甫一樣「不共世情熱」。〈典衣〉一詩中，臺靜農的身影便與杜甫重疊：

> 檢典春衫易米薪，窮途猶未解呻吟。

[74] 臺靜農：〈悼亡〉，《臺靜農詩集・龍坡草》，頁 67。
[75] 方瑜：〈坐對斜陽看浮雲——讀臺靜農老師的詩〉，《臺靜農詩集・附錄》，頁 45。
[76] 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總第 22 期（2015 年 12 月），頁 199。
[77] 臺靜農：〈題白匋為繪半山草堂圖〉，《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31。
[78]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第 5 篇，第 4 章，頁 436。

君看拾橡山中客，許國長懷稷契心。[79]

居蜀期間，臺靜農生活困頓，要靠變賣衣物支撐生計；杜甫也有因為嚴酷現實而典衣買醉的經歷，其〈曲江二首〉其二便寫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80] 面對艱難境遇，阮籍尚且能「窮途而哭」，[81] 詩人（臺靜農及杜甫）卻壓抑著內心，無法透過哭泣來發洩窮途之悲。從全詩來看，柯慶明認為「臺先生雖有行路艱難之嘆，但是未必有日暮窮途之感，因為他仍有他的社稷關懷，以及用世的期待」。其讀法把三、四句讀成臺靜農以杜甫來自況、自勉。不過，末兩句也許能作另一種態度的詮釋，即臺靜農是冷嘲而非肯定山中客。三四句分別典出〈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兩首都是杜甫自述懷抱之作。在後者中，杜甫開首雖然自歎「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但始終堅持理想：「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82] 而在前者的自述中，杜甫則更加悲觀，自嘲「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隨之哀歎「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83] 此聯也許可理解為臺靜農正在冷嘲「許國長懷稷契心」的杜甫，只落得當「拾橡山中客」的下場，雖故作豁達，情緒其實更接近於〈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的悲哀絕望。因此，將柯慶明的解讀反過來說更貼合臺靜農自比杜甫（和阮籍）的意圖——正因臺靜農一直抱有社稷關懷及用世期待，才反過來導致其無力感與日暮窮途之感更加強烈和深刻。

---

[79] 臺靜農：〈典衣〉，《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0。
[80]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6，頁 447。
[81] 阮籍「哭窮途」典見《晉書・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49，頁 1361。
[82]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4，頁 264。
[83] 同上注，卷 8，頁 693。

「稷契心」一詞又見於〈題白匋為繪半山草堂圖〉的第五聯，進一步解釋了臺靜農悲憤之心的緣由。

> 非無稷契心，網羅彌天掣。秦火燼詩書，楚坑築賢哲。黔染萬夫首，碧化三年血。瞻烏悲爰止，巨鰲負天竊。道喪運陽九，肥遁殊不劣。借得半山居，風標土鑿穴。文史橫前席，古今笑蹇拙。羞言仁與義，思雜莊與列。吳子妙丹青，為我圖荒垤。掃天蕉翻綠，穿嶂松盤鐵。濁醪時沉埋，一醉忘天裂。虎豹怒當關，自有黃公譎。龍性非能馴，餐霞良足悅。[84]

「非無稷契心」至「思雜莊與列」，便是詩人抒發有志難伸的感慨。儘管詩人有如杜甫般的「稷契心」，但在網羅彌天的現實中處處受制，甚至目睹「秦火燼詩書，楚坑築賢哲」的悲劇。詩人為文學文化及知識分子的消亡感到悲哀失落，而「瞻烏悲爰止」一句讓人聯想到《後漢書・郭太傳》的記載：郭太因太傅陳蕃（？-168）、大將軍竇武（？-168）為宦官所害而哀哭，繼而哀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85] 在時運困厄無道之時，詩人提出「肥遁殊不劣」的主張，詩題中的「半山草堂」便是他在黑石山的隱居之所。[86] 居蜀期間，詩人與古今文史相伴，「羞言仁與義，思雜莊與列」。仁義為儒家提倡的價值觀，臺靜農講述杜甫的偉大時，也提及杜甫與「仁」的關係：

> 要知杜甫之所以偉大，是由於他所承受的儒家思想的傳統，在他詩篇中所流露出的，無往不是「己飢己溺」的精神，仁者的懷抱。他自己也說

[84] 臺靜農：〈題白匋為繪半山草堂圖〉，《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31-32。
[85]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68，頁 2226。
[86] 臺益堅〈爝火〉記道：「父親將全家遷去鄉下，住進黑石山中一茅草屋。……那間泥牆泥地的小『堂屋』中，掛著父親以紅紙寫的對聯：芝草終榮漢；桃花解避秦。門口掛的是白紙寫的『半山草堂』」，見頁 117。

>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此熱情，才能勇猛地寫出他那時代黎元在昏暴的政治下遭受的命運。我們讀他的詩，不可不體會從他那「窮年憂黎元」所放射出的光輝。[87]

臺靜農的早年作品《地之子》、《建塔者》也展現了如杜甫般的「仁者懷抱」：以「悲心」寫述人們如何在貧瘠荒蕪、冷漠孤絕的鄉土中倔強存活的悲苦小說；以「憤心」批判時代惡暗和社會不公。[88] 但在白沙時期，他竟怯於甚至怕談仁義，造成這種心態的其實就是現實的「網羅彌天掣」，使「稷契心」無法實現，因此只好以「肥遁殊不劣」來自我寬慰。儘管詩人以杜甫自比，但「濁醪時沉埋」一聯可見，他借酒澆心中塊壘的行為其實更接近於魏晉名士的姿態。[89]

〈寄兼士師重慶〉一詩中，臺靜農除了仿效杜甫、以詩史之筆書寫國難外（或許出自以杜甫自況的心態），也涉及其老師沈兼士（1886-1947）為抗日作出貢獻的小敘事來補史之闕，這兩部分內容錯落地在詩中呈現。

> 神州突狼豕，几杖隔烽煙。過庭虛北望，鬱結信難捐。去年師入蜀，虎口脫身還。慷慨魯連恥，栖遑墨子胼。迴車入三秦，憂危更拳拳。觀兵殽函外，稅駕華山顛。山東逞妖氛，鋒鏑闇三川。擁兵五十萬，將軍棄甲先。瞬息失中原，雄關授人鍵。非無熊羆士，控弦勇自煎。清渭流哭聲，華嶽撐煩冤。俛仰悲道喪，人謀豈關天。重踏嘉陵道，汲江耕石田。

[87]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第 5 篇，第 4 章，頁 441。

[88] 「悲心」與「憤心」出自樂蘅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集中的生命情懷〉，載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 年），頁 225-246。

[89] 柯慶明談論此詩時，同樣指出「其（按：臺靜農）飲酒又頗有阮籍的意態」，見〈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頁 115-117。

春秋魯史筆，好付名山傳。賤子棲沙頭，託命事陳篇。心馳侍塵席，久滯渝州船。何年出巫峽，問字懷槧鉛。[90]

先講臺靜農如何以詩史之筆書寫國難。此詩開首即描述狼奔豕突、烽火連天的戰況，詩人在大後方徒勞地遙望北方，[91] 心中鬱結難以拋除，這同時也是所有在大後方的人們的心境。「山東逞妖氛」之後數聯則講述戰爭形勢以及戰亂帶來的悲劇。日軍首先登陸山東，進而逐步擴張攻勢。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擁兵五十萬」的將軍竟然率先棄甲，導致中原地區瞬間淪喪，重要關隘被敵人掌控。透過「轆轤繩子」的歷史觀，可知這種情況在當時並不罕見。長城戰役（1933）中，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1871-1949）在夜中率領部下滿載私物潛逃，不戰棄守承德，又如 1938 年的徐州突圍戰，蔣介石和李宗仁（1891-1969）認為再守徐州無疑是自掘墳墓，因此棄守徐州。[92] 而明清之際亦不乏將軍棄甲之事，如《講史》寫到闖王攻城時，城外三營大兵不敢穿平日的號衣軍裝，只著單掛小褲倉皇竄逃，來不及換裝者則在闖兵面前「裸身長跪，哀告求降」。[93]

自「非無熊羆士」開始，便轉入議論和抒情。詩人指出，國家並非沒有驍勇善戰的將士，但只顧內鬥自煎。至於遭受戰禍的百姓，詩人則以誇張筆法描繪其悲痛：清澈的渭水中彷彿流淌著哭聲，而百姓承受的煩冤如華山般高；走在道路上，不論抬頭低頭，都是悲哀沮喪的行人。目睹百姓苦難的詩人，在詩中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時也批判導致社會動盪的始作俑者——「人謀豈關天」點出戰時國家處於弱勢的問題關鍵，強調並非天命如此，而是統治階層的人為造成。

[90] 臺靜農：〈寄兼士師重慶〉，《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21-22。
[91] 此點蒙匿名審查人提醒，謹此致謝。
[92] 李守孔：《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73 年），頁 101；武月星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 年），頁 297。
[93] 臺靜農：《亡明講史》，頁 22。

在家國的大敘事之下，有不少個體為抗日而努力，「去年師入蜀」四聯及「重踏嘉陵道」後數聯即講述沈兼士的英雄事蹟。沈兼士於 1942 年入蜀，此前在北平進行抗日活動。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他因不願為日人做事，所以不再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工作，之後與同人英千里（1900-1969）、張懷（1896-1987）、董洗凡等教授秘密組織「炎社」（取顧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939 年，炎社擴大組織機構，改名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簡稱「華北文協」），沈兼士則擔任協會主任委員，主要從事宣傳抗日救國，護送愛國師生到後方，組織各種抗日鬥爭活動等工作。1942 年 12 月 16 日，沈兼士為躲避日方追捕，便偕女兒乘車離開北平去大後方，[94] 所以詩中的「虎口脫身還」即形容沈兼士在被追捕的危險處境中得以虎口逃生。詩人遂稱讚沈兼士氣概正直，不向日人屈節投降（用「秦帝魯連恥」典），[95] 而他終日為抗日奔走，無暇安居，就像墨子（468 B.C.-376 B.C.）一樣勞苦。1943 年，沈兼士要到陝西（「三秦」）去，沿著連接蜀地與陝西的嘉陵古道返回。陝西作為大後方的最前線，鄰近山西、河南、湖北等淪陷區，經常遭日軍轟炸，當時沈兼士是為了和淪陷區出來的青年座談、提供幫助才出蜀，[96] 所以詩人既擔憂他的安危，同時敬慕其所作所為，並以「汲江耕石田」形容其不畏艱苦的精衛精神。（不過，「石田」為多石而不可耕的土地，後被引申比喻為無用之物，這一詞彙又會否隱含了徒勞無功的隱憂？）其後，詩人表明歷史會記載沈兼士的功績，傳予後人。

94 酈千明、汪素梅：〈沈兼士年譜簡編〉，《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總第 43 卷第 3 期（2021 年 3 月），頁 27。

95 「秦帝魯連恥」出自謝靈運（385-433）〈臨川被收〉詩，見南朝宋・謝靈運著，黃節注：《謝康樂詩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卷 4，頁 115。此點蒙匿名審查人提醒，謹此致謝。

96 同上注，頁 29。

（二）「黑夜」與「夜不能寐」

顧彬（Wolfgang Kubin）指出，以往僅作為自然現象的「黑夜」，在中國從君主專制轉向民主社會的轉型期中，與革命、國家、民族聯繫起來，並以臺靜農的老師魯迅的《狂人日記》及《吶喊》自序為例，說明夜晚的場景和光明與黑暗對峙的主題意象在魯迅作品中佔有主導地位。[97] 用「夜」來反映對國家時局的感受，是一代文人共有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而小說家臺靜農也不例外。白沙時期，臺靜農對「夜」的感受在《講史》中同樣有發揮，第一段是闖王入京後紫禁城的景物描寫：

> 苑中夾道，黑暗異常，因內監各謀逃命，燈火自滅，已無人過問。皇帝扶著王承恩左背，蹌踉走出後苑，直往萬歲山（原注：即煤山）去，行經山麓時，皇帝已遍身是汗，氣喘力軟，即坐石上稍息。不久鼓力走到壽星亭。時天方曙亮，內城各門洞開，闖軍正瘋狂入城，炮聲疎稀，火光已少，惟喊哭之聲，有如海嘯。遙見宮中樹木新葉正發，晨光中已能辨出油綠的柳色，皇帝不禁心酸，霎時間過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一一的陳現在面前，忽又一片漆黑，一切都不見了，只有漆黑。[98]

對比以往的燈火通明，黑暗是異常的，這一異象象徵了大明王朝希望的破滅，無人在意熄滅的燈火就如無人在意大明的未來。而描述崇禎帝（1611-1644）前往煤山時，臺靜農通過捕捉崇禎攙扶宮人的姿態，以及遍身是汗、氣喘力軟的身體反應，來突出這位曾經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如今面對國家將亡的脆弱、絕望與無助。當他來到壽星亭時，「天方曙亮」，在象徵希望的清晨中，崇禎看到的卻是

[97] 〔德〕沃爾夫岡・顧彬：〈黑夜意識和女性的（自我）毀滅——評現代中國的黑暗理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頁 50-51。
[98] 臺靜農：《亡明講史》，頁 31。

內城闖軍的猛烈攻勢漸減，而人們的哀嚎聲漸增，且如一浪接一浪的海嘯。與這片哀景對比的，是遠處宮中「樹木新葉正發」的生氣蓬勃，宮內的無限生機與外面的衰敗亂象在崇禎眼裡形成不和諧的交融，而他回憶中「過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已經回不去了，最後重複兩次的「漆黑」，正代表了崇禎個人與國家的黯淡未來。第二段則講述弘光帝自顧自逃亡，把宮娥女優被拋棄在深宮。

> 雖然西華門是冷冷的開著，好像地獄在張著大嘴。從這大嘴中跳出罷，但外面是可怕的黑夜，一個男人也沒有，繁華的南京城被埋葬了！[99]

作者以「冷冷的開著」、「地獄在張著大嘴」等陰森幽冷的描寫，來營造及強化宮娥女優的恐懼感——這群女性原本是「清白的被驕養著過日子的」，[100] 現在被迫為帝國陪葬，只因清兵入關後她們都會被俘獲。這一比喻寓示了無法阻擋的災難和毀滅，儘管可以選擇逃離，但「外面是可怕的黑夜」，與留在宮裡無異，同樣是沒有光明與希望的。最後則以這群女性對應南京城：曾經備受皇帝寵愛的女子此時被拋棄，繁華一時的南京城因戰爭而毀滅，以此體現南明的國祚衰敗。從以上兩段對「夜」的描述可見，《講史》並非只有輕浮滑稽的敘述，[101] 當中的景物描寫及譬喻也隱隱顯露臺靜農所處時代的黑暗，以及他作為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的憂心忡忡。

然而，在看不到盡頭的黑夜中，臺靜農不僅遵從著新文學所建立的「黑夜」寫作模式，在第一身視角的抒情中，臺靜農又回歸古典詩歌「夜不能寐」的傳統。中國古典文學中，自屈原（339 B.C.-278 B.C.）以來便有不少涉及夜晚的詩

[99] 同上注，頁 148。
[100] 同上注，頁 147。
[101] 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載臺靜農：《亡明講史》，頁 xii。

作，[102] 其中「夜不能寐」不僅是生理狀態的描述，更是情感與思想的載體——不論家國之思抑或現實苦悶，都在不眠之夜的孤寂氛圍中被放大，而不眠之夜也成為了文人宣洩情感、抒發志向及展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掙扎的重要契機和途徑。而《白沙草》中，亦有 11 首與「夜」相關的詩作：

詩題	詩句
1.〈丙寅中秋〉	玉宇無塵桂魄寒、燈前兒女分瓜果
2.〈泥途〉	月落風高霜滿轄
3.〈寄霽野北平〉	荒村夜柝摧殘夢、又因寒月起相思
4.〈夜起〉	大圜如夢自沉沉，冥漠難摧夜起心。
5.〈夜行〉	秋星觸眼明、未解夜如醒
6.〈去往〉	月落千山墨
7.〈和青峰韻〉	且隨永夜待春還
8.〈無題〉（望斷芳州杜若殘）	子夜歌沉淚已闌、月中消息誤鳴鸞
9.〈無題〉（玉鬗雲鬢絕世姿）	要負今宵天豈許，欲尋往事夢難期。
10.〈孤憤〉	青燈濁酒夜沉沉
11.〈贈周光午〉	老我空山夜雨心

表二：《白沙草》中使用「夜」意象的詩作[103]

[102] 如〈哀郢〉中有：「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又如〈悲回風〉：「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載戰國・屈原著，金開誠等校注：《屈原集校注・九章》（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508、520；626。

[103] 上列詩作分別出自臺靜農：《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6、8、10、11、14、16、26、28、29、33、35。

相較魯迅詩，魯迅詩也時常出現深夜和中夜，不過，從其早年作〈自題小像〉（1901）及晚年最後一首作品〈亥年殘秋偶作〉（1935）得見，啟明星及黎明的意象始終貫穿其中，魯迅對這個時代仍是抱有希望的。[104] 反觀《白沙草》，多為詩人獨處於昏暗不明的夜，或是日落即將轉入黑夜，[105] 儘管上表顯示部分詩句有象徵光芒的「月」和「星」，但其前後的綴字多為「寒」、「落」、「秋」，充滿了肅殺蕭瑟之氣，可見其情調是失望、苦悶甚至是冷眼旁觀的。以〈夜起〉為例：

> 大圜如夢自沉沉，冥漠難摧夜起心。
> 起向荒原唱山鬼，驟驚一鳥出寒林。[106]

「大圜」即是天，筆者以為可引伸為「天下」，此句即講述當時情形之低沉，且如夢般讓人感到迷惘。儘管夜晚昏暗不清，但還是難以摧殘詩人的「夜起心」。「夜起心」讓人聯想到阮籍（210-263）的《詠懷八十二首》，[107] 其中其一「夜中不能寐」也與夜起相關：

>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108]

---

104 魯迅：〈自題小像〉，收入氏著：《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7 卷，頁 423；〈亥年殘秋偶作〉，頁 451。

105 如「落日烽火暗九州」、「窮鴉逐晚」、「前村落日騰簫鼓，誰遣巫陽下九閽。」「芳荃寂寞高丘冷，夏木陰陰晝亦昏。」分別出自臺靜農：〈乙酉歲暮〉，《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20；〈丙戌元宵友人談近事奮筆書之〉，頁 23；〈蜀江岸行〉，頁 25；〈次青峰見懷韻〉，頁 34。

106 臺靜農：〈夜起〉，《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1。

107 柯慶明則認為臺靜農的「夜起心」更近於屈原的「獨醒」，見〈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頁 115。

108 魏・阮籍：〈詠懷八十二首〉其一，收入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全三國詩，卷 5，頁 215。

阮籍在魏晉易代之際面對險惡的政治環境及黑暗現實，內心苦悶、夜不能寐，因而「徘徊」，進行「彈鳴琴」、「鑒明月」、聽「孤鴻號」、「翔鳥鳴」的一系列活動，表達其於時代長夜中的「憂思」及「傷心」。同樣夜不能寐的臺靜農，起身向「荒原」唱〈山鬼〉，然而回應詩人的，只有從寒林而出的雀鳥。儘管臺靜農就此打住，但熟悉中國古典詩歌的讀者能夠領會到，這隻「鳥」便是阮籍詩中不斷悲號驚鳴的孤鴻翔鳥，透過這兩首詩歌的秘響旁通，我們得以意會臺靜農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弦外之音。

（三）《楚辭》典故意象

抗戰期間，屈原成為了愛國符號，而《楚辭》，尤其是屈原的作品，也被視為表現愛國主義的精神。儘管「屈原愛國」的觀念早在清末已然生發，但隨著亡國危機加劇及救國情緒高漲，以致屈原以往的忠臣形象被「愛國詩人」、「民族詩人」所取代。[109] 受到這種觀念影響，學者及作家紛紛藉《楚辭》研究及創作寄託心志。如戰前從事文字、訓詁學研究的湯炳正（1910-1998），因「抗戰事起，轉徙流浪，自受民族危亡之苦，遂與屈原思想感情產生共鳴，開始研習《楚辭》。」[110] 郭沫若則撰寫了《屈原》歷史劇（1942）及《屈原研究》（1943），並表明他是借屈原的時代來象徵當時的時代。[111] 至於當時的屈原詩作選本，大多收錄了〈國殤〉並肯定此為屈原所作，這種作者歸屬顯然出於編者的愛國情

[109] 詳見王余輝：〈解構・建構・實現——近代「屈原愛國」觀念生成與傳播的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20 年第 5 期，頁 111-127。

[110] 轉引自周建忠：《楚辭考論》（上海：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249。

[111] 郭沫若：〈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第 17 卷，頁 158。

懷。《中國民族文學講話》（1940）的編者陳易園（？-？）更表明「國殤一篇，是屈原衛國殺敵的心志所表現出來的作品。」[112]

而《楚辭》意象及典故在《白沙草》中也十分常見。據筆者統計，此類詩作共有 9 首，除了直指楚辭及相關篇名，如「楚騷」（〈山居〉）、「山鬼」（〈夜起〉）、「騷」及「天問」（〈移家黑石山山上梅花方盛〉），亦有細引楚辭句意處，如〈次青峰見懷韻〉中的「芳荃寂寞高丘冷」，〈遊李花谷〉中的「晞髮狂歌太古情」以及〈薄暮山行霧作〉和〈蜀江岸行〉使用的叩（九）閽意象。[113] 這些詩作中，臺靜農並非完全為了使用意象典故的本事，更多是為了取意象典故的情感面向。以〈夜起〉為例，第三聯中的「山鬼」，詩人所召喚的應是〈山鬼〉中「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杳冥冥兮羌晝晦」、「靃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等詩句。[114]「余」雖處於幽暗、黑夜，還是獨立於高聳山巔，等候山鬼到來，不過最終仍未能遇見神靈。對臺靜農而言，「余」對山鬼的堅持與他對知識分子的勸勉——「在時代的激流裡挺住自己」——是相通的，[115] 因此他通過「起向荒原唱山鬼」，來表達其在黑暗時代中的自我堅守，在「永夜」（〈和青峰韻〉）中等待希望的曙光。

又以 1945 年作的〈乙酉冬馬歇爾來作迎神曲〉為例，其中的楚辭典故便蘊含了詩人的褒貶大義。

冉冉雲旗動，靈車下大荒。千官爭警蹕，列宿拜堂皇。

112 陳易園編：《中國民族文學講話》（福州：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福建省分會，1940 年），頁 21。

113 方瑜認為《白沙草》「多半直指楚辭篇名，並未細引楚辭句意」，此說有待斟酌。見〈坐對斜陽看浮雲——讀臺靜農老師的詩〉，《臺靜農詩集・附錄》，頁 44。

114 屈原：〈山鬼〉，《屈原集校注・九歌》，頁 274、277、280。

115 尉天驄著：〈百年冰雪身猶在——記臺靜農先生〉，《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印刻文學，2011 年），頁 25。

帝篆風雷護，民冤虎豹狂。霜威凜咫尺，伐鼓奠椒漿。[116]

詩題中的「迎神曲」是理解這首詩的關鍵，迎神曲即是〈九歌・東皇太一〉——這是祭祀東皇太一的祭歌，儘管諸家對東皇太一的身分說法不一，但可以「眾神之尊」概括之。[117] 1945 年 12 月，馬歇爾（George Marshall，1880-1959）以美國總統杜魯門（1884-1972）特使身分來華，「調處」國共關係。[118] 詩的首聯即以帶有神仙意味的字詞來寫馬歇爾抵華的場面：「雲旗」讓人聯想到〈九歌・東君〉中的「載雲旗兮委蛇」；[119]「大荒」則聯繫到《山海經》。頷聯描寫官員迎接馬歇爾時「爭警蹕」（「警蹕」即古代帝王出入時，在前清道阻止行人的官吏）、「拜堂皇」的模樣，可見詩人是有意將馬歇爾塑造成神（東皇太一）和古代帝王的形象。

後兩聯則展現臺靜農對官員的諷刺與批判。頸聯呈現了官員面對馬歇爾和百姓時截然不同的態度：面對「帝篆」（或指馬歇爾的話語或文書）時，如擁簇神仙的風雷般為其保駕護航；但看到百姓冤屈，卻如守在九重天關門的虎豹般發狂咬傷下界的人（〈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120] 通過詩句並置展現官員的兩副面孔，產生極大的張力——包含詩人對統治階級的憤怒和關懷百姓的悲憤之心。而尾聯的「霜威」，既寫當時天氣，亦諷刺在上位者對民生疾苦的冷漠，只顧「伐鼓奠椒漿」以迎神。可見，這首詩對《楚辭》意象典故的化用就正如張暉所言，是將個人情感與家國記憶交雜在一起。[121]

116 臺靜農：〈乙酉冬馬歇爾來作迎神曲〉，《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7。
117 屈原：〈東皇太一〉，《屈原集校注・九歌》，頁 187-194。
118 臺靜農：〈乙酉冬馬歇爾來作迎神曲〉，《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8，注 1。
119 屈原：〈東君〉，《屈原集校注・九歌》，頁 256。
120 戰國・宋玉：〈招魂〉，載宋・朱熹集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集注》（長沙：岳麓書社，2013 年），卷 7，頁 108。
121 「以《詩經》、《楚辭》為基準的中國詩歌傳統，使得詩人在創作時，往往將個人的情感和家國的記憶交雜在一起。」見張暉：《中國「詩史」傳統》，頁 282。

（四）遺民傳統

白沙時期的臺靜農特別喜好明遺民詩。舒蕪回憶道當時臺靜農對晚明文學藝術有深好，常對他說起明遺民詩。有一次他們遇到路邊的荒冢，臺靜農忽然便舉出「頹墳狐穴黃花老，廢殿烏棲泥馬尊」一聯（〈蜀江岸行〉中「頹」作「荒」，「老」作「冷」），並說「我自己也很喜歡，冷！」。後來舒蕪看到《明四百家遺民詩》，才知道臺詩詩境中的冷，是從明遺民詩來的。[122]

「冷」可謂是臺靜農對明遺民詩特徵的認知，那麼，這種冷從何而來？面對異族入侵、國家亂亡和社會動盪，明遺民詩專注於個人與時代，當中流露出的情感格調可大致概括為悲涼、壓抑、失落、憤懣。這些情感促使明遺民更傾向使用具有文化積澱的象徵性意象，具體又可分為以下數種：（一）表現戰亂，（二）表現荒涼景象，（三）表現遺民故國情懷及民族意識，（四）表現遺民精神信念，（五）表現人生困境。[123] 臺詩亦有以上特徵，如上引「頹墳」一聯呈現了因時間流逝而頹敗的畫面：荒廢的墳墓成為野狐的巢穴，拜祭的菊花早已凋零，而廢棄的廟寺以及置於一側的泥做的馬塑像，現在只有烏鴉棲息其中。

〈答林逸來書問以戰後計者〉則以具有文化積澱的意象來表現人生困境，當中流露了臺靜農對戰後局勢及國家前途的深刻思考，可以說是當時知識分子心靈史的寫照。

> 風波如此欲安歸？窮鳥投林敢擇棲。
> 久矣磨礱英氣盡，只將白眼看鯨鯢。[124]

---

122 臺靜農：〈蜀江岸行〉，《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25-26、26 注 5；舒蕪：〈憶臺靜農先生〉，《臺靜農詩集・附錄》，頁 12。

123 李瑄著：《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頁 563-566。

124 臺靜農：〈答林逸來書問以戰後計者〉，《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6。

儘管抗戰結束，社會仍是風波不斷：國共兩黨共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整頓戰後的國內事務，但雙方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而再度激起矛盾，後因搶佔東北受降區而發生軍事衝突，國共關係再度變得惡劣。林逸來信問臺靜農戰後有何打算，臺靜農則反問道：在如此動盪中，如何才能找到安穩的歸所？次句則以「窮鳥不擇木而棲」（李猷語）表示他仍處於觀望的狀態。[125] 此聯讓人聯想到《詩經・正月》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126] 以及上文引郭太因陳蕃、竇武為宦官所害而哀哭的故事，透過與這些文本互文，可以看到詩人對國家未來命運的擔憂與無奈。當時臺靜農正值壯年，但戰爭時間之長將其「英氣」都消磨殆盡了——就如他在〈離白沙口號〉中自稱「酒人」、「野人」，居於白沙的江鄉山野，只能以酒澆灌心中塊壘，隨時間流逝而「塵中老」、「華髮」生。[127] 詩人的一腔熱血因時間與時局而無處可灑，只好如阮籍般以「白眼」看待兇暴不義的「鯨鯢」。以上可見，臺靜農對明遺民詩的喜好是與上文提及的時事及亡明史一脈相承的。

而臺靜農對遺民詩的喜好不僅限於明代，如〈讀元遺山四十頭顱半白生句有感〉便與以金遺民自居的元好問（1190-1257）相關。

> 端居每有遺山感，四十頭顱半白生。鈞黨最憐烹五鼎，陳兵爭欲墜三城。
> 書空未信天能補，畫鬼翻嫌佛有情。青史三千何擾擾，怕聞鶴唳到華亭。[128]

[125] 李猷：〈極可珍貴的臺靜農先生遺詩〉，轉引自《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16。
[126] 漢・毛亨傳，漢・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載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卷 12，頁 398a。
[127] 臺靜農：〈離白沙口號〉，《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37。
[128] 臺靜農：〈讀元遺山四十頭顱半白生句有感〉，《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24。

首聯的「四十頭顱」出自元好問詩〈鎮平縣齋感懷〉（1226）。[129] 元好問從赴長安應試到寫成〈鎮平縣齋感懷〉，已經歷多次科舉失敗及仕途蹉跎，〈示崔雷詩社諸人〉詩中「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一聯即見他的灰心喪氣。[130] 但目睹金王朝每況日下的現狀，以及強大蒙古帝國的威脅，使元好問無法徹底放棄入仕以改變時局的理想，因此時常在仕與隱中掙扎。而臺靜農讀元詩時有所感觸，因此自言平日「端居每有遺山感」。頷聯指向詩人所處的現實，內有「國民黨以清黨名義濫殺無辜」（羅孚語），[131] 且大烹五鼎，生活奢侈；外則戰爭不斷，家國搖搖欲墜。面對如此時勢，詩人感歎「書空未信天能補」，除了呼應元詩中的「書空咄咄知誰解」，同時用了「殷浩書空」的典故。詩人似是盼望「天」能修補某些事物，或許是家國到裂變，亦或是黨派的腐敗，但「未信」一詞道明「人謀豈關天」（〈寄兼士師重慶〉），盡顯其失意與激憤。「畫鬼」指向當時的魑魅魍魎、頷聯的「鈎黨」，他們的存在反而使詩人猜疑佛是否有心識、知覺及感覺。[132] 而追溯「有情」的梵文「sattva」，又有「存在」之意，[133] 那麼我們又可以理解此句為：畫鬼反而懷疑佛是否存在。尾聯則進入更寬廣的歷史閎域：歷史何其紛紛擾擾（這聯繫到臺靜農當時在國立編譯館負責整理史料），但最怕的還是聽到華亭的鶴唳聲。此句對陸機（261-303）典故的使用，或許意味著詩人害怕聽到知識分子如陸機般被讒陷的消息，又或許是他害怕從

[129] 〈鎮平縣齋感懷〉：「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嗚嗚卻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擬漫崢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見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卷 3，頁 516。

[130]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26，頁 2742；元好問：〈示崔雷詩社諸人〉，《元好問詩編年校注》，頁 119。

[131] 羅孚：〈老去空餘渡海心〉，轉引自《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25。

[132]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nd Lewis Hodou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349b-350a.

[133] 〔日〕望月信亨等編：《望月仏教大辞典》（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会，1971 年），頁 210c。

歷史——尤其是打敗仗的歷史——中洞悉國家未來的預言。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在國家未亡之時，臺靜農卻如此愛好遺民詩？也許他是試圖訴諸遺民傳統及遺民的姿態，表明自己不同於阿諛奉承者和轉風使舵者，而是在時代巨變中堅守古代文人的風骨及文化傳統。

值得指出的是，臺靜農對杜甫入蜀、「黑夜」與「夜不能寐」、《楚辭》典故意象及遺民傳統的古典資源的調度並非單獨運作，而是時常混揉在一起的。以〈孤憤〉為例：

> 孤憤如山霜鬢侵，青燈濁酒夜沉沉。長門賦賣文章賤，呂相書懸天下瘖。
> 萬里烽煙縈客夢，一廬風雨證初心。推尊將欲依山鬼，雲亂猿愁落木森。[134]

首聯呈現了時間的積累：詩人的孤憤堆積如山，使其長出白髮（如霜雪般侵襲兩鬢），之後詩句聚焦在一個深沉的夜晚，只有詩人獨醒，青燈濁酒的陪伴更突顯其孤獨。詩人不寐，是因為此時身處他鄉，思念故園，且戰亂與動盪的烽火一直在睡夢中縈繞。詩人經歷的「風雨」不止於此，還有前文述及的政治和文壇的黑暗。「長門賦」句講述了當時的學者爭著把著作送呈蔣介石，以博得稱譽為榮，詩人認為這種行為有如漢賦大家司馬相如（179 B.C.-117 B.C.）兜賣其〈長門賦〉般自貶身分。[135] 「呂相書」句則是將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發表的《中國之命運》比為呂不韋（？-235 B.C.）的《呂氏春秋》，臺靜農對這句的解釋是：「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懸之國門，說是有能易一字者賞之千金，其時誰敢去易其一字呢？當然天下啞然無聲了。」[136] 時人因忌憚呂不韋位高權重而不願得罪他，所

134 臺靜農：〈孤憤〉，《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 33-34。
135 同上注，頁 34 注 1。
136 同上注，頁 34 注 2。

以不作批評，這個情況有如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發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政治觀點，[137] 批評聲音在威權面前被壓制。儘管如此，詩人未曾忘記自己的初心。在這不安的時局中，詩人最推崇尊敬「山鬼」，即指向堅守風骨的知識分子，而末句通過化用杜甫〈登高〉，表達其憂國憂民的心志。

五、結語

本文通過將「讀史」、《講史》及《白沙草》置於臺靜農生命史及對日作戰的脈絡，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其在白沙時期對所處時代的回應。臺靜農的歷史轉向與抗戰期間興起的歷史研究及寫作風潮密不可分，同時國立編譯館的工作為他接觸史料提供機會及便利，這些因素都為其寫作的歷史轉向和歷史觀提供養分。細觀其歷史觀，他認知到歷史的連續特質源於事件不斷重演，因而鼓勵人們讀史以認知及瞭解時下狀況，但另一方面，他發現人性的不變是導致歷史不斷重演的原因，因而悲觀地認為，即便人們認知到歷史的連續特質，還是會重蹈覆轍。他的歷史觀似乎充滿了悖論：既然讀史無用，為何他還要讀史，並且鼓勵他人讀史呢？這種弔詭，或許是因為他內心深處同時存在著絕望與希望——縱然無力改變現狀，但他可以選擇以讀史來展現其作為知識分子的姿態；他對他人讀史的鼓勵，與魯迅「鐵屋中的吶喊」的比喻有相似之處，期盼有朝一日有人能夠打破令人絕望的歷史循環。

承接臺靜農的歷史觀，後續探討了他在「讀史」、《講史》及《白沙草》中對時事及歷史的思索。「讀史」、《講史》作為臺靜農有意面向公眾的作品，

137「中國國民黨革命如能成功，則中國國家方獨立。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見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上海：正中書局，1946 年），第 7 章，頁 205。

當中對時局的批判是相對理性的，較敏感的時事批判則以歷史來借古諷今，其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循著連接古今的繩子循環往復，受時事觸動而回到歷史，又藉著歷史思考當前時事。而《白沙草》雖是臺靜農的私人創作，[138] 但不乏對時局的書寫，這種書寫使得詩作瞬間成為了具備公共性質的「詩史」，且呈現了不同於抗敵救亡大敘事的視角。通過分析其在詩作中召喚的詩歌歷史及中國文學文化傳統，我們能更深入地理解他對時代及所經歷事件的感知和詮釋。

以上可見，臺靜農在白沙時期的創作不僅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更展現了抗戰期間大後方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學回應時代。儘管臺靜農不是舊時代的文人，他在白沙期間的心境，卻與其對「波外翁」喬大壯（1892-1948）的描述頗為相似：「一個舊時代的文人，飽受人生現實的折磨，希望破滅了，結果所有的，只是孤寂、憤世、自毀。」[139] 然而，與喬大壯的「自毀」不同，臺靜農選擇以書寫「抒吾憤懣於萬一耳」。在 1946 年為《葉廣度詩集》撰寫的序文中，臺靜農描述其與葉廣度（？-？）在白沙期間的生活：

> 夫蘭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固達士所深惜，而人情所難為。然而呵壁問天，日斜叩鵬，徜徉澤畔，歌哭無端，憂能傷人，意自難免。

[138] 儘管《白沙草》最後收入《龍坡丈室詩稿》，但柯慶明指出，不論「稿」、「草」，皆有未定之意，見〈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頁 95。林文月《靜農墨戲集・編後記》（臺北：臺益公出版，1995 年）記：「臺先生……纏綿病榻之際，曾以詩抄影印本若干分贈門人，言稱：『好玩的，給你們留作紀念。』」則見臺靜農生前未有將其詩作公開發表之意願。而賴佩暄認為，臺靜農以舊體詩及這種私人寫作的形式，「儼然是一種自我銘刻與紀念」，通過詩稿的保存及抄寫，以存留其個人情感、記憶與生命經驗，見〈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頁 199。

[139] 臺靜農：〈記波外翁〉，《龍坡雜文》（臺北：洪範書店，1988 年），頁 98。

> 吾友葉君廣度，少有奇節，壯歷憂患，喪亂以來，憩影沙頭，問樊遲之據，學東陵之瓜，似樂放逸，與世相忘。然而骨梗橫胸，芒角在喉，發為歌詠，多見慷慨，是豈如淵明所云「人生實難」，有不獲已之情乎！
>
> 丙戌之夏，余困居廢院，槐陰蔽道，鼯鼠當階，昨猶絃歌，今若敗剎，環誦斯集，感喟不勝，恨無藻翰如吾廣度，抒吾憤懣於萬一耳。[140]

儘管二人有如魏晉名士般「似樂放逸，與世相忘」的舉止表現，但仍然「骨梗橫胸，芒角在喉」，感受到「人生實難，有不獲已之情」，正如臺靜農所言，「憂能傷人，意自難免」，但他們並不選擇如阮籍般「自毀以求全」，[141] 而是通過「呵壁問天，日斜叩鵬，徜徉澤畔，歌哭無端」等效仿屈原問天、行吟河畔的行為，以詩「發為歌詠」、「抒吾憤懣於萬一耳」。這種抒情與王德威提出的「發憤以抒／杼情」的傳統一脈相承：[142] 臺靜農在時代的動盪以及歷史寫作的風潮中，藉文字跨越時空，與古人相互和應。而透過臺靜農的個案，我們得以理解大後方的知識分子在亂世中書寫的意義。

[140] 臺靜農：〈《葉廣度詩集》序〉，《靜農佚文集》，頁 159。

[141] 臺靜農認為，阮籍「自毀以求全」的行為只是自我麻醉，看似放達，實際上是在「肢解自己」，所以是「人情所難為」的，見臺靜農：〈嵇阮論〉，《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1989 年），頁 99-101。

[142]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總第 33 期（2008 年 9 月），頁 84-85、103。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戰國・屈原著，金開誠等校注：《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漢・毛亨傳，漢・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載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解經》，載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

南朝宋・謝靈運著，黃節注：《謝康樂詩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唐・孟棨撰：《本事詩》，陽山顧氏文房叢書，據明正德顧元慶輯刊。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宋・朱熹集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集注》，長沙：岳麓書社，2013 年。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史部，第 598-599 冊。

明・黃宗羲撰：《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0 冊。

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李守孔：《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73 年。

李瑄著：《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周建忠：《楚辭考論》，上海：商務印書館，2003 年。

林文月編：《靜農墨戲集》，臺北：臺益公出版，1995 年。

武月星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 年。

張暉著：《中國「詩史」傳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年。

〔日〕望月信亨等編：《望月仏教大辞典》，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会，1971 年。

郭沫若著：《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第 17 卷。

_____：《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

尉天驄著：《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印刻文學，2011 年。

陳易園編：《中國民族文學講話》，福州：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福建省分會，1940 年。

楊治宜著：《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新北：聯經，2024 年。

臺靜農著：《龍坡雜文》，臺北：洪範書店，1988 年。

_____：《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1989 年。

_____，許禮平編注：《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2001 年。

_____：《中國文學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年。DOI：10.978.986350/2982

_____，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新北：聯經，2018 年。

_____，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DOI：10.978.986350/3996

_____，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 年。

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上海：正中書局，1946 年。

蔣夢麟著：《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 年。

魯迅著：《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7 卷。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and Lewis Hodou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二）專書論文

方瑜：〈坐對斜陽看浮雲——讀臺靜農老師的詩〉，載臺靜農撰，許禮平編注：《臺靜農詩集・附錄》，香港：翰墨軒，2001 年，頁 43-53。

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載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頁 vii-xxiii。DOI：10.978.986350/3996

_____：〈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載氏著，涂航等譯：《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2017 年，頁 529-584。

陳永發：〈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載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參　全民抗戰》，臺北：國史館，2015 年，頁 111-218。

舒蕪：〈憶臺靜農先生〉，載臺靜農撰，許禮平編注：《臺靜農詩集・附錄》，香港：翰墨軒，2001 年，頁 1-36。

樂蘅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集中的生命情懷〉，載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 年，頁 225-246。

嚴志雄：〈《申報》中的錢謙益〉，載林宗正、張伯偉主編：《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詩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302-330。

（三）期刊論文

王余輝：〈解構・建構・實現——近代「屈原愛國」觀念生成與傳播的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20 年第 5 期，頁 111-127。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總第 33 期（2008 年 9 月），頁 77-137。DOI：10.6351/BICLP.200809.007

_____：〈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 65 期（2017 年 7 月），頁 285-309。DOI：10.29708/JCS.CUHK.201707_(65).0010

何寄澎、許銘全：〈文學史書寫的典型——寫於臺靜農先生《中國文學史》三版付梓前〉，《書目季刊》第 49 卷第 3 期（2015 年 12 月），頁 129-143。DOI:：10.6203/BQ.2015.12.49.3.10

〔德〕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黑夜意識和女性的（自我）毀滅——評現代中國的黑暗理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頁 48-53、67。

林立：〈骸骨的迷戀：論新文學家創作舊體詩的緣由〉，《東方文化》總第 43 卷第 1、2 期合刊（2010 年 12 月），頁 197-233。

柯慶明：〈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總第 9 期（2011 年 2 月），頁 91-138。

廖肇亨：〈希望・絕望・虛妄——試論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圖像與文化詮釋〉，《明代研究》總第 11 期（2008 年 12 月），頁 95-118。DOI：10.978.986350/3996

臺益堅：〈燼火——追悼先父臺靜農〉，《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 2 期，頁 116-117。

劉龍心：〈通俗讀物編刊社與戰時歷史書寫（1933-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總第 64 期（2009 年 6 月），頁 87-136。DOI：10.6353/BIMHAS.200906.0087

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總第 22 期（2015 年 12 月），頁 155-208。

酈千明、汪素梅：〈沈兼士年譜簡編〉，《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總第 43 卷第 3 期（2021 年 3 月），頁 14-34。

（四）期刊文章

陳禮江：〈教育部近兩年編審民衆讀物之經過〉，《教育通訊（漢口）》1938 年第 39 期，頁 21-22。

蔣中正：〈革命的教育〉，《教育通訊（漢口）》1938 年第 37 期，頁 17-20。